

生还是不生 这是个问题

■章梅芳

若干年前,我曾译过一本书,书名是《怀孕文化史:怀孕、医学和文化(1750—2000)》。在翻译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怀孕和生育远远不只是家庭事务,它更多地是社会事件,广泛涉及到国家的人口管理和经济发展。这几天参加女科技工作者座谈会,顺带调研“孕哺期”女科技工作者的职业状况与条件保障问题,更是体会到生育对于女性而言的特殊影响。

在很多情况下,生育并非女性个人愿意还是不愿意的问题,我们无法或不能用“女性是否愿意承担母职”的讨论去简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更不能因此而对选择不生育的女性加以道德谴责。因为,很多时候并非女性不愿意而是条件不允许。为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生育背后的社会文化与环境条件。我想,这正是日本记者小林美希写作《不让生育的社会》这本书的初衷。

日本被认为是老龄化社会的典型代表,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日本女性的生育意愿非常低,社会呈现出少子化的趋势。作为长期关注日本年轻人职业发展问题的劳动经济记者,小林美希自然关注到了日本社会的生育困境问题。

她在这本书中通过丰富生动的访谈案例,展现了日本社会对孕妇的职场歧视、产科医护资源的紧张,以及残疾儿童的艰难处境等客观现实,读起来让人感到十分沉重。其中,女性遭遇“妊娠解雇”“育儿离职”以致回归家庭后又不得不面对“孤独育儿”的现实案例,大概会让不少放弃事业的全职母亲们产生深切的共鸣。

显然,年轻的职场女性如果选择生育,就不得不考虑一些基本的问题。例如,自己的职业生涯会不会因此受到很大影响,包括有没有被解雇、被边缘化或失去晋升机会等方面的可能性,返回职场后孩子有人照顾吗?如果双方的父母亲都不能帮上忙,那么有合适的托儿所,或者能找到有经验而且可靠的育儿嫂吗?家庭的经济条件许可吗?孩子上小学以后的教育问题谁负责?丈夫理解并支持自己在事业上的追求吗?他能共同分担家务和育儿任务吗?当家庭和事业难以兼顾时,谁能选择放弃职业追求甚至做出完全回归家庭的策略性调整呢?这些问题都十分现实,它们的答案直接影响到女性的生育选择。

从根源上看,上述问题最终还是受不同社会的性别文化和劳动性别分工观念的影响。虽然今天早已不再是要求女性三从四德的时代了,但贤

野性、无我,才是生命的本性

■魏文玥

我们并非民谣中所谓的“步从这个世界穿行的陌生人”,也并非威廉·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里的踽踽独行之人,我们的身体和思想、我们的“科学与艺术”,就如它们的本性一样,自然而野性。

继博物学力作《看不见的森林》后,博物学家、美国南部大学联盟环保研究员戴维·乔治·哈斯凯尔于2017年出版了这本吟唱树木的《树木之歌》,上文正是出自于此。

哈斯凯尔在担任生物学教授,本书从生物学角度解释动植物相互作用的,又从博物学的视角欣赏生命的传奇故事。书中选择了十种树编入三个乐章,着重展示跨物种相依相系的关系、地质变迁和生命的苦集灭道、城市里的树木和人类。

“人与自然”这样的表述暗示人是自然之外、与自然对立的客体。但人其实是哺乳动物的一种,是生物链的一环,依靠其他动植物分解出的氧气生存。如果生态失衡,人也会没有立锥之地。“当我们能够意识到人类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美与善的辨别能力就出现了。它源于与生命社群连接的人类思想,而不是人类单纯地从自然之外向内窥视。”

增进对自然的了解有助于人们认识自己。比如人需要在自然中舒展灵魂。在《吉贝》的故事里,作者讲述了生活在亚马孙的瓦尼拉社群对吉贝树的信仰。生活中,瓦尼拉人利用高大的吉贝树的回声传达信息,哪里遇到了危险,哪里有野兽,哪里迷路了;精神上,他们认为森林是精神、梦想和现实的交融之处,当心中迷惘,便来跟吉贝树交流,吉贝树可以使他们的精神焕然一新。

文中有很多动人的细节,当西方人习惯了使用钢钉固定树木,并且把森林作为原材料产地和景观的时候,瓦尼拉人却会因为对树木钉钉子而愧疚不已,向树道歉、跟树说话。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惜是人之初对于万物的尊重和怜惜。

比如万事万物因缘起而生,因缘灭而散。脱离所有关系,就没有生命存在。《香脂冷杉》讲述根系和菌落的互惠共生。细菌促进根系生长,根系为细菌提供糖分。细菌层保护根部免受入侵,根部通过真菌菌丝向其他植物体传播信息。对于生活在气候恶劣的北寒林中的香脂冷杉来说,这种“真菌—根系”的协同合作至关重要。作者借用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真正的生活”是共同的生活,而不是“作为个



《不让生育的社会》, [日] 小林美希著, 廖雯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年8月出版, 定价: 45元

妻良母依然是我们社会中流行甚广的理想女性的角色身份。

我们知道, 观念和文化的改变是长期的过程, 但并不能因此而无所作为, 具体的改变依然依赖于有效的政策支持。

小林美希在书的末尾给出了一些温暖有爱

“表面上看, 生与不生是她们的自由和权利, 实质上她们的选择高度依赖于家庭的小环境和

社会的大环境。面临生育困境, 应该认识到母职不只是女性的家庭角色义务, 她们实际上还承担了人类得以繁衍和存续的社会职责。

《不让生育的社会》, [日] 小林美希著, 廖雯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年8月出版, 定价: 45元

的例子, 这些事例展示了某种美好的愿景和可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例如, 对孕产女性给予支持的企业、将产妇和婴儿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医院、老人与幼儿和谐共处的综合养护机构等等。究其根本, 还是尝试通过呼吁社会营造良好的育儿环境去改变日本女性不愿生育的现实。

德勒兹: 哲学与艺术互不需要

■吕小羽

1995年11月4日, 在法国巴黎十七区的公寓楼, 有一位老人不堪肺病折磨, 从住室的窗户跳楼自杀身亡。这位老人就是法国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吉尔·德勒兹, 享年70岁。

吉尔·德勒兹,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复兴尼采运动中的关键人物, 通过激活尼采而引发了对差异哲学和欲望哲学的法兰西式的热情。

德勒兹去世后, 各国学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其哲学思想, 并撰写了不少专著。美国学者罗德·博格所著的《德勒兹论音乐、绘画和艺术》是其中之一。

该书分为音乐、绘画和艺术三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德勒兹与瓜塔里有关宇宙音乐的论述, 重点分析了法国音乐家梅西安等人的作品, 以此阐释德勒兹有关解构叠歌的思想, 并从音乐动物行为学、生物学和生态学角度考察音乐和艺术的关系。

第二部分探讨绘画艺术, 作者认为德勒兹将绘画的问题建构为解构“面孔—风景”。因而重点阐释了这一概念, 并以弗兰西斯·培根、塞尚、凡高等著名画家的画作为例, 指出画家的任务是打破面孔性的模式, 脱离现行符号的控制, 捕捉贯穿面孔、身体和风景的不可见的变形力量。第三部分对德勒兹《什么是哲学》一书中的部分段落进行了解读。

毫无疑问, 本书因为探讨了艺术形式的哲学性(亦即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一深奥问题, 读起来十分“烧脑”, 但其中不乏有意思的文字和观点。

例如, 在探讨自主叠歌时, 作者问道: “叠歌在哪里? 是在章鱼肌肉袋的收缩中, 还是在章鱼游泳时划开的水中? 叠歌是在蝉中, 还是在它吸血的哺乳动物中? 是在蜘蛛、蜘蛛网还是在似乎为蜘蛛网设计捕捉对象的苍蝇中?”

作者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 “叠歌是环境中形成的差异节奏, 是环境成分之间的关系。”作者进一步举例说明: “齿鹑园丁鸟演唱它的领域性歌曲, 但它的音乐动机只是叠歌的一部分, 叠歌还包括它栖息的树枝、它转动的树叶、它吸引的配偶、它竞争对手的歌曲, 以及它控制的空间。”经过这三个逻辑环节, 作者将德勒兹关于叠歌的思想阐述得十分清楚。作者还赞叹道: “这便是伟大的自然音乐, 它是贯穿于环境秩序点、领域和通向外界的跨领域开口的差异节奏的创造性交织、包裹和展开。”

对于绘画, 德勒兹也有独到的见解: “绘画的目的是对抗面孔化的俗套, 解构面部—风景, 从而使作用于身体和世界的不可见力化为可见。面孔化的宇宙是一种稳定的形式、固定的形状, 是理性的坐标、连贯的叙事。”“每个画家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不同的视觉俗套、不同的审美惯例集合、不同的面孔化身体的网络和特定符号体系中的风景。每个画家都发明了特定历史情境的参数范围内破除俗套、惯例和面孔化的手段。”

在作者看来, 德勒兹的艺术思想只是他的哲学的一个方面, 但其艺术思想十分独特, 揭示了哲学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感知性的、情动性的思维模式的固有可能。

对于艺术和哲学的关系, 德勒兹是这样概括的: “哲学和艺术是思维模式, 其中一个以概念思考, 另一个以感知和情动思考。”“艺术揭示可能, 哲学揭示潜在, 但最终两者都参与潜在进入现实的生成中。”“基于概念的哲学思想和基于感知和情动的艺术思想是潜在的两种表现形式, 是飞跃中的形式和被动

与日本相比, 我们国家因妊娠与育儿而导致的离职率应该还没那么高, 大部分年轻女性并没有选择成为全职母亲, 她们尝试做到职场和家庭兼顾。然而, 成为全职母亲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是与社会逐渐脱节, 陷入孤独育儿的境地; 尝试二者兼顾的往往又可能哪边都没有做好, 既不能成为优秀的员工, 又因无法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而心存愧疚。当下很多的影视作品里也能看到这种选择的艰难和其背后隐藏着的母职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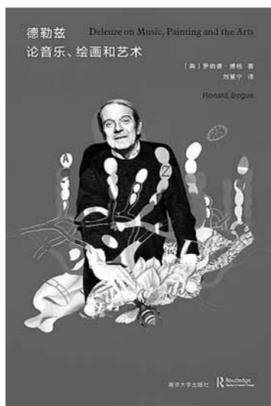
小林美希访谈的那些日本女性, 都经历了这样的煎熬。在我们的身边, 也有很多的女性正经历着这样的痛苦选择。表面上看, 生与不生是她们的小和权利, 实质上她们的选择高度依赖于家庭的自由和社会的大环境。

为此, 我们也需要及时作出调整, 以应对可能面临的生育困境。首要的一条是认识到女性生育本身的价值, 无论是对于家庭而言, 还是对于社会而言。

我们应该因认识到生育本身的重要性而真正认可和充分肯定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及其生育行为的重要价值, 而不是把女性视为生育的工具; 应该认识到母职不只是女性的家庭角色义务, 她们实际上还承担了人类得以繁衍和存续的社会职责。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家庭中, 都应给予这一付出充分的认可, 并采取具体的支持措施。

家庭中, 育儿是两性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丧偶式育儿的状况得不到根本改变, 生育困境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职场中, 妊娠解雇或育儿解雇都应被严格禁止。理想化的状态是, 女性重返职场之后能有相对宽松的职业环境, 包括适当的弹性考核制度、支持她们顺利开展工作的倾斜政策、新的专业学习和技能培训的机会, 以及基本的物质保障, 例如为妈妈们准备的哺乳室等。而对于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也应及时跟进, 例如建设并规范化管理适合低龄幼儿的托儿所等机构, 做好承接更多新一代的充分准备。

要而言之, 生与不生, 这的确是个问题。但这个问题, 显然不应该只是女性个体面临的选择问题。相应地, 这个问题的解决途径也绝不是强迫或说服女性去承担她们的角色义务, 而是谋求为女性提供选择生育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德勒兹论音乐、绘画和艺术》, [法] 罗德·博格著, 吕小羽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5月出版, 定价: 80元

德勒兹从一开始就有政治和历史抱负, 从一开始就充满着尼采式的激进的责任意识和革命意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 德勒兹的确与众不同。

德勒兹的政治学思想也很特别。德勒兹的着眼点是欲望, 因此他的政治学亦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 是一种欲望政治学。德勒兹并不排斥阶级政治, 但是, 要颠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 阶级政治是不充分的。德勒兹与其他后结构主义者不同的是, 他从来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上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盛行, 彼时德勒兹已经是一个激进的后结构主义者了。有学者指出: “德勒兹从一开始就有政治和历史抱负, 从一开始就充满着尼采式的激进的责任意识和革命意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 德勒兹的确与众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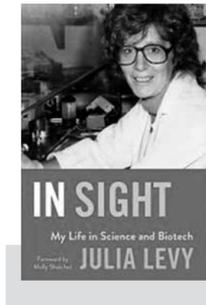
本书作者罗德·博格是美国佐治亚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是美国著名的德勒兹研究专家。长期以来, 德勒兹以其思想艰涩、自创概念众多而难以理解, 本书尝试用“阅读”德勒兹的方法, 在解读德勒兹的思想的同时, 梳理其文本节点之间的发展路线、文献来源, 以及其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 从而阐明德勒兹的艺术理论, 不失为一本全方位、深入浅出的德勒兹思想入门读物。

回到本文开头, 1995年德勒兹的自杀令人震惊和困惑。因为很少有哲学家选择自杀。哲学家每天要阅读、分析大量晦涩的文本, 他们所思考的问题又很深邃, 所以做哲学研究的人一般都具有坚强的意志力。德勒兹显然并非意志力薄弱之人。因此有人宁愿把他的死理解为“企图通过自杀获取更多的空气”。

11月4日是德勒兹去世25周年纪念日, 对于“这个法国数一数二的哲学才子”, 学者福柯由衷表达了他的敬意: “二十世纪是吉尔·德勒兹的世纪。”

域外

当利维问起妈妈当时的感受时, 她妈妈用英国式的务实口吻回答说: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没什么好说的。”这一人生态度对利维影响很大。



■武夷山

2020年9月,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 Julia Levy (茱莉亚·利维) 的自传 *In Sight: My Life in Science and Biotech* (本书作者译为“眼光: 我的科学与生物技术人生”)。

本书分为33章, 讲述了对科学和发现的热爱如何驱动着利维冲破性别歧视的障碍, 成长为著名学者和生物技术公司 CEO 的故事。作者尤其详细介绍了研制一种治疗视力减退的药物的全过程, 从实验室开发到市场推广应用。本书标题含有 sight (视力、眼光) 这个词, 有一语双关的意思。

1934年, 利维生于新加坡, 父亲是荷兰人, 母亲是英国血统。小时候, 她家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如今的印度尼西亚)生活。她父亲在一家商业银行工作, 收入颇丰, 家里雇了两个佣人、一个厨子、一个保姆照料她和姐姐。

6岁时, 她父亲听说荷兰战败、向德国投降的消息, 就十万火急地安排妻子和两个女儿去了加拿大。他自己则被关在日本侵略者的战俘集中营里很多年。二战结束后, 他才得以到温哥华与家人团聚, 那时他已一文不名, 而且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利维写道, 多年来, 我时常想, 母亲在我们初到加拿大的那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那时她只有依靠自己, 而她从来没有上过班, 没做过一顿饭, 现在却带着两个小孩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当利维问起妈妈当时的感受时, 她妈妈用英国式的务实口吻回答说: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没什么好说的。”这一人生态度对利维影响很大。

好在利维很争气, 学习用功, 尤其是科学和英语两门功课成绩优秀。1950年, 她在温哥华上高中。一次和女同学一起吃盒饭午餐时, 大家聊起为什么要上大学。多数女生觉得, 在大学里能结识今后许事业成功的小伙子, 嫁给这样的人, 一生就有依靠了。利维则下定决心, 要自己干一番事业, 而不是倚赖未来丈夫的事业成功。尤其是, 她还选择了读理科。那时的科学界, 女性凤毛麟角。

利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以优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然后她结婚了, 随丈夫去英国, 并在伦敦北郊的国家医学研究所谋了份差事。在该所工作期间, 她有幸见到了包括女性科学家在内的几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

利维回忆说, “她们很厉害, 争强好胜”, 是女性的榜样楷模。该所给了她读博的机会。1958年, 她在伦敦大学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59年, 母校 UBC 给她提供了一个助理教授岗位, 年薪约 4800 美元, 她欣然接受。更重要的是, 学校给了她实验室和办公室, 方便她开展免疫学和微生物学的教学与研究。

20世纪60年代, 利维的事业呈起飞之势。很多国际学术会议请她作报告。在这一阶段, 她开始了第二段婚姻, 生下三个孩子。上世纪70年代, 她开始研究拟用作治疗癌症的光活化药物的叫喹啉类化合物。基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她与小贝四位同事一道于1981年创立了一个名叫 QLT 的生物科技公司。该公司研制的癌症治疗药物 Photofrin (光福林) 于1993年在加拿大获准上市, 后来又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但是, 该公司名气最大的业绩是研制了针对视网膜黄斑变性的光动力治疗光敏剂 Visudyne (维速达尔)。

一开始, 利维是 QLT 公司的首席科学家, 后来成为 CEO。QLT 公司业务兴盛, 已发展到十亿美元的量级。所以, 利维这一辈子既获得了令人艳羡的科学成就, 也挣了很多钱。由于贡献突出, 她获得“加拿大官员荣誉勋章”, 也被多家大学授予荣誉学位。

本书相当的篇幅都是叙述她的创业过程, 以及从首席科学家到 CEO 的惊人转型。书中忠实地描述了药物开发的艰难、医药创新成果商业化过程中的张力以及女性在科学界发展面临的巨大障碍。为本书作序的是多伦多大学化工与应用化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Molly Shoichet。她说, 利维的故事即使发生在今天, 也是引人入胜的。

有眼光的科学家茱莉亚·利维